

花随人圣庵摭忆

下

黄 濬 著 李吉奎 整理



民国史料笔记丛刊

中華書局

花随人圣庵摭忆

下

黄 濬 著 李吉奎 整理



民国史料笔记丛刊

中華書局

二七〇 禅家自省之法

赵明远日以七事自考：一切妄念，稍止息否？一切外缘，稍简省否？一切触境，能不动否？一切语言，能慎密否？一切黑白，咸分别否？梦想之间，不颠倒否？方寸之间，得恬愉否？《宗镜》有十问，以定纪纲：还得了了见性，如昼观色，似文殊等否？还逢缘对境，见色闻声，举足下足，开眼合眼，悉得明宗与道相应否？还览一代时教，及从上祖师言句，闻深不怖，皆得谛了无疑否？还于差别间难，种种征诘，能具四无碍辨，尽决他疑否？还于一切时，一切处，知照无滞，念念圆通，不见一法能为障碍，未曾一刹那中暂令间断否？还于一切顺逆好恶境界现前之时，不为间隔，尽识得破否？还于百法明门心境之内，一一得见微细体性根源起处，不为生死根尘之所惑乱否？还向四威仪中，行住坐卧，钦承祇对，著衣吃饭，执作施为之时，一一辨得真实否？还闻说有佛无佛，有众生无众生，或赞或毁，或是或非，得一心不动否？还闻差别之智，皆能明达，性相俱通，理事无滞，无有一法不鉴其原，乃至千圣出世，得不疑否？又《妙喜禅师语录》，其《与李汉老书》：“不识日来随缘放旷，如意自在否？四威仪中，不为尘劳所胜否？寤寐二边，得一如否？于仍旧处，无走作否？于生死心，不相续否？但尽凡情，别无圣解。公既一笑，豁开正眼，消息顿忘。得力不得力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矣。然日用之间，当依黄面老子所言，剝其正性，除其助因，违其现业，此乃了事汉，无方便中真方便，无修证中真修证，无取舍中真取舍也。古德皮肤脱落尽，惟有一真实。又如栴檀，繁柯脱落尽，惟真栴檀在。斯违现业，除助因，剝正性之极致也。公试思之。”

按此皆禅家明心见性之谈，实即儒门三省吾身之旨，此义今人久不谈矣。放观当世，唯力与质相眩逐，相矜尚，虽曰救死，抑其皇皇疲怖，亦足以自病而殒殒也。若不于平旦清明，下一反省，则虽急装搵剑，何预于八识田根本之计哉？唯善知识，乃有四威仪，可惜尘劳人，不会此意。

二七一 罗瘿庵挽沈子培诗

《瘿庵集》中有《沈培老^①挽诗》云：

先公所荐士，王沈天下名^②。辛丑初识公，一麾去帝京^③。
駸寻十六载，易朝如隔生。是时初复辟，畿甸虑构兵。
萧寺谒吾师，苦口劝之行^④。吾师颇感动，就公计分明。
公言三日酺，只乐吉语听。石火遽相及，玉貌困围城。
萧然美森馆，二老对寒檠^⑤。明夷本无咎，蒙难亦艰贞。
南归屡纓疾，伏枕望太平。己亥谒起居，论事辨析精。
今秋访精舍，病榻愈送迎。忽闻麈尾谢，使我心骨惊。
公学若巨海，导之穷八溟。公文若元气，引之贯日星。
后进失依归，觉路已晦冥。当为天下恻，宁止哭交情。

此诗颇关掌故。瘿公尊人峰农先生，名家劭，同治乙丑进士，

① 沈曾植，字子培，号乙庵，浙江嘉兴人。光绪进士。官刑部主事，安徽提学使。治史地之学，工诗词。有《蒙古源流笺证》、《海日楼诗集》、《海日楼文集》、《海日楼丛札》等。

② 原注：先公以同治庚午顺天乡试分房得公及闽县王可庄卷，诧为奇才。

③ 原注：辛丑识公于灌阳唐尚书座上，公旋出守。

④ 原注：南海先生与公及王病山同寓贤良寺。

⑤ 原注：南海先生避居美国使馆，公就焉。

官翰林院编修，沈子培、王可庄，皆其庚午北闱分房所得士也。峰农先生逝时，瘳公才周晬，故与王、沈之齿辈相悬绝。其言南海与子培一节，则皆民国六年事。是年夏，张少轩以十馀营兵入京，号为调停督军团，实谋复辟。南海入都，外间尚知之，培老偕来，则事至秘。及七月一日后，以培老为学部正大臣，众始略谄，犹有疑海日老人在沪必不来者。瘳公与任公并为万木草堂弟子，而稍毗于梁。当时形势固万无一幸，闻瘳曾痛为南海剖析利害，而培老谓少须数日。乃三日马厂师起，不及旬而定，此时京津情势一幕活剧，至今忆之，历历如昨日事。老耄愚忠，为人所弄，固不必再论。而培老于辛酉秋竟卒于沪渎，去复辟之丁巳，才四年也。瘳公丁巳有《兵后问樊山翁起居》诗，中云：“同居石火流丸地，是我槐阴午睡时。举国未成三日醕，长安又了一枰棋。”即咏复辟，与后之挽沈诗，语意相类。大醕三日，疑是培老有此语。

二七二 沈子培论宋诗源流

培老自是一代大师，其史地之学，何减潜研；耽精内典，又非尺木所及；于诗亦力破玄关，不作犹人语。予于癸丑秋，涛园先生挈往樊园钟集，云培老、病山、完巢、雪澄、节庵诸先辈俱在，磬折作礼趋出，见犹未见也。其后十年，培老托人言，欲观予所为诗，不记诸贞长〔壮〕或瘳公，为述此旨。予因寄一诗，并附丛稿。培老览既大喜，特寄一笺，题予集云：“有所悟者能入，有所证者能出。欧、苏悟入从韩，证出者不在韩，亦不背韩也，如是而后有宋诗。作者清才寡思，悟处极多，此后皆证分矣。发菩提心，行菩萨行，字字《华严》法界来，岂不快哉！”按其中诱掖语，自逾分，不必言。其论悟证及

宋诗源流，极可为后生辟一法门。

凡学佛者，以信解行证为四级，培老所谓悟，即信解，证，即行证。禅门证果最难，以诗喻禅，亦须卓然成一家，庶可谓证，此岂孱笔所敢企及？

至宋诗导源于韩，此说已旧。从其大处言，唐与宋本不当区别。开、天极盛，难乎为继，故中晚取径于秾丽流转。浸寻靡极，宋初西昆，已渐参硬语。至于荆公、欧公，皆从太白、子美、昌黎、柳州直求法髓，不复步趋中晚。眉山崛起，追踵前规，复参禅偈，宗风大畅，沾溉一代。其后哲匠辈出，或毗于刚，或毗于柔，虽态有万殊，而理只代嬗。故与其以朝代为区分，不如谓为文质之相代，寻其源委，一以贯之。译以新词，各求出路而已，非云唐别有唐，宋别有宋也。从其小处言，则所谓时代作风，俨有鸿沟，莫之能越。由斯立论，所谓宋诗源于欧、苏，欧、苏从韩悟入者，如培老所说，亦自是一条线索。夫唯中晚之绮弱不足师，杜、韩之雄腴无以加，不得已，则就其萧疏真率处求得余地。此种假定，必为欧、苏悟入时之用心。今观昌黎诗中，如《听颖师弹琴》，如《归彭城》，如《嗟哉董生行》，如《南山有高树行》，皆六一诗所从出。如《秋怀》，如《赠刘师服》，如《赠张籍》，如《华山女》，如《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》，如《南溪始泛》，如《游城南》十六首，试读东坡诗，往往似之，即可知东坡得力处。然欧有欧之韵与度，东坡有其气势与机锋，又绝不类韩，故知培老之言信也。至宋诗虽不能以欧、苏概之，然试寻苏门之法乳，则陈、张、秦、晁各有绝诣，即山谷之巨刃摩天，要不能不朝宗于东坡。下逮南渡后之尤、杨、范、陆，前者如晁具茨，后者如姜白石，其气味终如中泠泉之与昊天寺井水，曾无大异。至元遗山、萨都刺、高季迪，则其味不同矣。然则培老有欧、苏而后有宋诗之界说，亦信也。

唯培老所示者，似未完全，欧公所宗有太白，不止于韩，东坡综合太白、柳州，亦不限韩，而韩与一切宋诗又皆从老杜各体变化脱胎而成。此说予意培老复生，必不能易。辛酉培老下世，予亦挽以一诗，起云：“元长斋壁柳恽句，千古才人为叹羨。”即言培老相赏予诗。其后有云：“独嗟杜韩证分语，造膝无由究动变。”言予意有未饜，而始终睽隔，未由造谭也。我思尊宿，复叹芜疏，证道无期，根尘俱钝，即字句之微，亦不知《华严》十玄门在何许？琐琐詮忆，不觉累纸。若云说诗，则皆肤论，世之作者，必喻谅之。

二七三 黎寿丞补述袁漱六藏书事

寿丞黎君，名门茂学，强记工书，今之虞伯施、欧阳通师也。比遗函于予，述袁漱六藏书数事，见闻精确，亟录以实吾札。其一云：“偶见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，言袁漱六先生家藏书事，予里居距袁家崎头湾故宅数十里，惜未尝一登其书楼。唯闻榆生观察歿后，其家自省城归老宅，家有老姨太太（不知为漱翁妾抑为榆生妾）者，家守书数厨，扃闭唯谨，不许家人窥。年久屋漏，水自厨顶灌入，而不之知，书悉浸透。某年晒书，则皆黏合不能揭，遂尽焚之，可谓浩劫，不知其中有几许孤本也。”

其二云：“袁家书经李木斋购去后，其余归湘潭曾子伦上舍（纪纲）家。迨曾家中落，叶奂彬、王佩初（礼培）、李郁华（瑞奇）又从而选购其精本。今长沙书估手，犹偶见有卧雪庐藏印之书，皆袁家物也。”

其三云：“榆翁有诸孙为英文教员者，予一日见其案头有《山白云词》，戈顺卿（载）通本墨笔批校，小行楷绝精，因从乞之，许举

全书赠我，后亦未践斯诺。以此观之，漱翁藏书之富，诚不可思议。其家人不甚爱惜，诚堪浩叹。”

按黎君与袁漱六同里，故所述翔细若此。然予又闻叔章言，漱六之书，亦有数箱，为郭葆生（人漳）所有。葆生亦朋辈中最恢奇者，元二年数从宴游，文章浩瀚，意气奋迅，不可一世，未意其俄焉长埋也。所藏书，闻尚封识未动，其得逃毁污，亦已幸矣。又前录散原与伯弢手札，注通隐度是何庆瀚，猿叟之子。顷寿丞为订其误云：“通隐为衡阳何承道，字朴园，其自刊诗稿曰《通隐堂集》，光绪乙酉优贡，官四川定远县知县。若何伯原先生讳庆涵，咸丰时已乡举，与伯弢年辈不相埒。”此则一洗向来之惑，尤足纫也。

二七四 西湖慨叹

东坡诗云：“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今日西子，不止不淡妆，直全是浓抹；不止浓抹，直大半为裸胸蜷发之欧洲妆。举世所趋，西子弱质，不敢云不宜，然亦难为消受矣。因叹世风正如丸走阪，比年江南道中，相逢谈吐，若不能杂以二三外国语者，几于不得侔于士类。然吾从北高峰下探天竺，过中印庵一遛，丛篁刺天，静碧隽悄，舆夫为予言：“此地最佳，外国人最喜来此。”斯言大有名理：其一，可知舆夫心目中，已品第外国人为鉴赏风物之第一流；其次，可知吾人流汗经营以期邀眄于东西人士者，乃其流连蹢躅，初不在乎红楼马路边，而仍在乎荒山丛竹流泉之间。然则苍寒宕野之趣，倘有可废而不可废者在乎？孤山旧有竹楼，白太傅诗：“小书楼下千竿竹，深火炉前一盏灯。此处与谁相伴宿，烧丹道士坐禅僧。”后林和靖结庐此中，尚厌其未邃，有诗云：“山水未深猿鸟

少，此生犹拟别移居。直过天竺溪流上，独树为桥小结庐。”逋仙此意，今日湖堦，胡可多得？孤山已成闹市，天竺亦几童山，唯馀一二处蓊蔚耳。后此物质腾达，湖与山皆当顶踵斩新，如日本之日光、箱根然。顾如苟且涂附，以夺自然之美，与夫浅识者但知“弹琵琶学鲜卑语”以相矜炫，则终令人为圣湖呃逆，而愁其僨大事也。

二七五 理安九溪十八涧

名胜之兴废，亦相嬗代。西湖诸山，天竺今固非佳，韬光亦何尝是最胜处？唯理安九溪十八涧尚幽曲。然近读张南皮未刊之中年诗，《使浙将归登舟后得杂诗》二十首，其第十九首云：“寻胜不辞出险去，理安已烬净慈无。秋光正好王程急，孤负西溪万顷芦。”是理安在光绪初时已毁灭，今之修楠高竹，皆四五十年间景物也。九溪十八涧信美，然吾读萧伯玉《南归日记》云：“十八涧两壁夹一天，一似天受其成形，渐小渐狭，渐迂渐缩，俯而就于两壁之约束，天盖在山中矣。山左穷，涧却避而趋于右，已山右穷，涧又忽跳而跃于左。山之左右变，而日之东西亦随与俱变。划焉中断，又忽然无际，足为目诱，多方以误之，则尝地倍賒。目为足导，绝利以趋之，则取境甚廉。始而心与目谋，复与足谋，意所独营，足与目尚未肯退而听也。已而足代为目谋，目代为足谋，相得甚欢，遂求路忘疲，余特往而从之耳。度涧二分之半，倦而憩于理安寺”云云。其状十八涧处，文特婉黠，屡游之余，觉十八涧尚未称如斯曲折，唯当以状房山入口之绝壁深涧，或相肖耳。广雅入杭病疟，其第四诗云：“盐豉如茶只楚呻，苦思乡味等思莼。真长竟受桓公米，亦是猪肝累主人。”自注：“求北地小米不得，马谷山中丞闻之，惠数斗。”

按此是病后胃弱，思食小米，马必有夙储，故以赠张，在当时自为难得也。

二七六 梁节庵两湖书院联

饮禹生家，因话及梁节庵栖凤宅食鱼斋一联，刘云：梁监督两湖书院时，有一联悬于监督堂，云：“燕柳最相思，忆别脩门三十载；楚材必有用，教成君子六千人。”盖两湖先为书院，后改学堂，肄业者先后六千人也。有改此联嘲之云：“君子一无成，人来梁上；脩门何所忆，凤去楼空。”下联仍言节庵京寓栖凤楼本事。

二七七 左宗棠西征举借外债

清末外债最勇于提倡者为左文襄，此在近代吾国经济史上，不能不谓为一大转变关键。文襄所主利用外资者，志在以巩固边防。盖在同治末年，文正薨后，国中重臣已觉内忧虽戢，外患必滋。所谓外患者，不复如道、咸间之但知懔畏英、法，而已怵惕于东西近邻之交迫。其作此主张者可分两派：左文襄之意，谓宜平定回疆以防俄；李文忠、沈文肃之意，谓宜先巩固海防以备日。光绪二年，文襄欲举债以平新疆，时沈、李即各疏反对，以为海军需款方殷，政府财力不能兼顾。文肃一疏，尤详明剴切。文肃对于国债之见解，略云：“国债之说，遍行于西洋，而西洋各国，受利受病，相去悬绝，则以举债之故不同，而所举之债亦不同也。夫开矿、造路、挖河，巨费也，而西洋各国不惜称贷以应之者，盖克期集事，课税出焉，本息之外，当有奇赢，所谓以轻利博重利，故英、美等国有国债，而不失为富。

强。若以国用难支，姑为腾挪之计，后此息无所出，且将借本银以还息银，岁额所入，尽付漏卮。”

其对于新疆之见解，略云：“新疆广袤数万里，戈壁参半，回部皆其土著，根蒂深固，既无尽剿之理，又无乞抚之情，似非一二年所能就绪。即使事机至顺，逆回弭首，诸城尽复，与俄为邻，互市设防，正重烦朝廷擘画，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。”

又云：“然谓西征可停，则臣等又断断以为不可。何者？我退则敌进，关陇且因而不靖，徒弃祖宗辛苦艰难缔造之地，而列戍防秋，劳费亦正相等。顾臣等窃以为左宗棠此行，不当效霍去病之扫穴犁庭，而当师赵充国之养威负重，将帅无赫赫之功，而国家受万全之福。诚能扼其冲要，坚壁清野，开水利，广屯田，考畜牧，关外多一分之产，关内即省一分之运。”

其诉海防款事，语尤质实，略云：“查海防专款，奉拨瞬将经年，臣葆桢恐分之则为数愈微，咨请各省尽解北洋，冀可藉资集事。而去岁所报解者亦仅江西十万，浙江十万，他省涓滴俱无。”

文肃此折，不外三点：一、言举债应用之生产方面。二、言处置新疆不宜全恃军事，应重建设，尤宜注重陕甘建设。三、则言海防即海军款项之重要与困难而已。文襄抗疏力争，对于文肃国债一点，驳之最力，略云：“至论各国举债攸殊，效有同异之分，尚非探原之论。夫英、美富强，甲于海国，由来已久，兵费借其本国之债，不待求助邻封，自然之理。”

又云：“各国衰亡之征，由其自致，若谓借本国之债者必富且强，借邻封之债者自貽困蹙，而引之为借用各国洋款之戒，非定论也。”

又云：“夫西征以复旧疆为义，非有争夺之心，借千万巨款，济目前急需，可免悬军待饷。”

又云：“平心而言，借用洋款，实于中国有益无损。泰西各国兴废存亡，并非因借债与不借债之故。”并举日本之举外债，为有逞志朝鲜之心。西班牙、土耳其之贫弱，与外债无涉。其眼光议论，居然透切弘远。得旨准其借款，文襄遂举外债三次，凡九百七十五万两，始收荡定新疆之功。计此近千万两中，首次为五百万两，事在光绪二年；次为一百七十五万两，事在光绪四年；最后为四百万两，事在光绪七年；皆向汇丰息借。后此中英经济关系之密切，斯亦一因。然左虽戡平回乱，而不能使之长留西北，坐镇经营，生聚建设，故虽复旧疆，而不能谋充实之术。不但新疆非左自镇，即关内陕甘，求如文肃所谓开水利、广屯田、考畜牧者，亦迄无此等事。盖西征战功，当时论者已谓肃州诸役非胜而败，勉力戡僇，仅而获定；其所恃以蕲未竟之功，壮将茶之志者，亦幸而有此数百万外债耳。此议虽苛，未始非事实也。文襄平回，及今不过六十年，所遗勋绩，唯有玉门大道之杨柳，今日亦垂垂尽矣。夫唯西征之不彻底，故千数百万两之财力，殆不异掷于鸣沙戈壁间。于此可见用兵之后，若不知继以政治建设，军力徒于虚耗。所谓“以马上得之，不能以马上治之”，正是此义，可为炯鉴。至文肃、文忠，于明治变法之时即重视日本，汲汲备防，其眼光视文襄之备俄，或更过之。而其始也，各省袖手不为助，清流诋文忠，若不容于口。其终也，平日误于颐和园，临事僭于大东沟。二十年间，无量金钱，仓皇虚牝，所换得者为国耻，为骂名，尚不如文襄之犹有毵毵垂柳。吾侪思往，盖不胜愤恫焉。文肃、文忠重视日本，不欲冒昧一掷之初意，既不为时流所谅解，文襄志业亦不克终，卒之清社既屋，陵夷至今，仍无以脱于两邻交迫之局，其颠连抑又加甚。斯盖由晚清政治不良，牝鸡司晨，贪妄狠侈，虽有武备，等于抱薪，始谋不臧，貽祸无极。是知一

切根本在于政治，为政之道，在于廉公，而女戎为害，尤足以涸国脉，此又与前之所言，同为炯鉴矣。按文襄西征，光绪初年三次借款外，于同治六年尚有两借款，一为百二十万两，一为二百万两，皆胡光墉在上海经借，谓之洋商借款，由关税担保。至光绪七年之四百万两一款，亦系胡光墉经手，其始英与德竞争，后卒归汇丰承借。

二七八 记曾习经

癸公既歿，葬于西山秘魔崖前，盖誉虎等所营卜也。葬之日，初夏而有雷雨，北地所罕觐。晦闻、刚甫及予皆预。予诗起云：“有雷填临岩，有雹助掘土。吁嗟山之阿，啜泣杂灵雨。”检晦闻诗，亦云：“午雷飞雹助凄其，天与愁阴入地知。”^①并言此。独刚甫无诗。此时见刚甫面容瘁槁，不久即下世，及今思之，当为最后一面矣。刚甫、晦闻皆粤人，刚甫辈行较长，思想亦有新旧不同，而有特操则同。揭阳姚君恣（梓芳），予之同学，刚甫之同县也。近为刚甫撰传，略云：

光、宣之际，吾国学者论海内诗人，于广东必举曾刚甫。

刚甫名习经，号蛰庵，刚甫其字，揭阳棉湖人也。兄弟四人，长撰甫，刚甫次居三，少从撰甫学。光绪戊子，张文襄辟广雅书院，选郡县高材生讲肄其中，刚甫兄弟并与选，同游梁文忠之门。当是时，文忠虽罢官，而直声震天下，诗名尤洋溢岭海间。

^① 黄节《四月二十五日西山会葬癸公》原诗云：“午雷飞雹助凄其，天与愁阴入地知。封树得缘今日长，山花栽了一春期。诗名被冢伤心见，世业成丘达者悲。太息交情只如此，送君临穴最终时。”

刚甫于辞于声，若天性然，既肆广雅，百学靡不窥，而于诗益寝馈不厌，偶有所作，芳馨悱恻，醺醺醉人，文忠惊异焉。己丑，与兄撰甫同领乡荐，逾年偕赴礼部试，登庚寅科进士，旋分户部。居京曹殆廿年，晚始补给事，累迁至度支部右丞。任右丞时，主计重臣倚畀甚至，各行省奏咨到部，或准或驳，动中肯綮，见者知出刚甫手。其他如改铸银币、创办税务学堂诸要政，擘划尤精，盖政声烂然矣。宣统三年，逊清让位。诏书未下前一日，刚甫毅然先引退，有诘之者，刚甫曰：“吾行吾心所安而已。”其后买田杨漕，与三数遗民耦耕其间。每乘农隙归省太夫人，旋复北行，往来京津，治田功不辍。田屡不逢岁，则斥其所藏图籍、书画、陶瓦以易米，往往不给，而刚甫啸歌自乐，不尤不怨不歆不畔者十五年。

鼎革之始，神奸张毂，思罗刚甫自重，刚甫不恶而严，巽词自免，而凜然示之以不可辱，大义炳然，可讯万世。以丙寅九月十八日卒于宣南郡馆，年六十，梁任公、叶玉虎二三故旧等，为襄治其丧。其手写诗一册，于是年六十生日手属任公曰：“子为我定之。”逾年任公为之序，玉虎为影印，署曰《蛰庵诗存》。其《蛰庵词》刻，见朱彊村《沧海遗音》书中。

刚甫治诗积四十年，未尝间断，仅成一卷，趋公之暇，视诗若性命，然不轻下笔，间或吟咏，厚自掩藏，尚细恶文，非至亲昵，未窥全豹；及遗稿流布，得之者若瑰宝。论者谓其诗境凡三变，晚年所诣，几入陶柳圣处，此论当与天下后世共定之。余交刚甫久，以少不习诗，故亦未及与刚甫细论也。壬子出都，刚甫手写八九月所读书题词十馀首见诒。余读罢，以为学人之诗，与才人之诗，向画鸿沟，不易并久矣。得此则众流一

源，学问情性，悉经陶冶，可砭时流无读书之识，而敢于为诗者，盖非此不能见刚甫之学，即不能读刚甫之诗。刚甫叹为知言。

任公与刚甫交最挚，尝题其遗像曰：“卓荦之才，而示物以无竞；介特之操，而予人以可亲。其施于政事者，文理密察，而不损其器识之俊伟；其发为文辞者，幽怨悱恻，而愈显其怀抱之清新。既不能手援天下之溺，则归洁其身，年四十四全节以去，六十而返其真。呜呼，此揭阳曾刚甫右丞遗像，有清易代之际第一完人。”其倾倒刚甫至此。读此，亦可识刚甫持躬、制行、治学、从政之大凡矣。

按君恚此传，大致取材于任公先生之刚甫诗序，君恚以古文笔法剪裁之。予意任公序文更真挚，今节录任公序中一段，以见梁、曾交谊。梁序中云：

当其盛年，鞅掌度支，起曹郎，迄卿贰，历二纪馀，综理密微，一部之事皆取办。盖在清之季，谙悉食货掌故，能究极其利病症结者，舍刚父无第二人。及清鼎潜移，则于逊位诏书未下之前一日，毅然致其仕而去。盖稍一濡滞，忽已处于致无可致之地，烛先几以自洁，如彼其明决也。

鼎革之际，神奸张毂，以弄一世才智之士，彼固夙知刚父，则百计思所以縻之，刚父不恶而严，巽词自免，而凛然示之以不可辱。自刚父之在官也，俸入外既一介不取，且常以所俭蓄者周恤姻族，急朋友之难，故去官则无复馀财以自活。刚父泊然安之，斥卖其所藏图籍、画书、陶瓦之属以易米，往往不得宿饱，而斗室高歌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。呜乎，刚父之所蕴蓄以发而为诗者，其本原略如此。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，

曰：“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”，“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”。喻此志也，可以读刚父之诗矣。

刚父长余六岁，其举乡试，于余为同年。余计偕京师，日与刚父游，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馆共住，每淪茗谭艺，达夜分为常。春秋佳日，辄策蹇并辔出郊外，揽翠微潭柘之胜，谓此乐非襁褓子所能晓也。甲午丧师后，各忧伤憔悴，一夕对月，坐碧云寺门之石桥，语国事，相抱恸哭。既而余南归，刚父送以诗曰：“前路残春亦可惜，柳条藤蔓有啼莺。”又曰：“他年独自亲调马，愁见山花故故红。”念乱伤离，惻然若不能为怀也。余亡命十馀年而归，归后屡值世难，不数数相见。刚父虽谢客，顾以余为未汨于世俗也，视之日益亲。去岁六月，刚父六十生日，余造焉，甫就坐，则出一卷相属曰：“手所写诗，予为我定之。”余新病初起，疗于海滨，将以归后卒读，而有所论列，归则刚父病已深，不复能相谭笑矣。

任公与刚甫交，视君恂为深且笃，行文中亦有浓至情味，允任公所长也。

刚甫所为壬子八九月所读书题诗凡十五首，早著录于《石遗室诗话》，其中可分为三类：第一是说诗妙谛，第二是参禅见地，第三是自述怀抱。如《题〈谢康乐集〉》一首，自注云：“康乐诗，记室赞许，允矣。至其制题简净，正复妙绝今古，倘张天如所谓，出处语默无一近人者耶？柳州五古，刻意陶、谢，兼学康乐制题，如《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》、《登蒲州石矶》、《望江口潭岛深迥》、《斜对香零山》等题，皆极用意，惜此旨自柳州至今无闻焉。不贤识小，正尔惭皇，后有大有大雅，或哂我南人学问，有牖中窥日而已。”如题《柳河东集》一首，自注云：“柳州五言，大有不安唐古之意。胡应麟举《南碕》一

篇，以为六朝妙诣，不知其五言诸篇，多摹大谢也。有唐一代，刻意大谢，柳州一人而已。”如《题〈元次山集〉》一首，自注云：“唐人蹇涩，极于樊宗师，开其先者，次山也。然次山究为雅正，所编《篋中诗》，如沈千运、孟云卿等六七人，咸与次山同声气，盖于唐古中自为一格，非卢玉川、马河南比也。皇甫持正，心仪次山，而以其碎为可惋，不知次山固自成为一种狷介文字也。”如《题〈谭友夏集〉》一首，自注云：“竟陵、公安，世斥伪体。然明自隆、万以降，摹拟剽窃，流弊万端，楚风一扇，变而之诡俊纤巧，文章关世运，盖至是明业亦衰焉。世无巨子，而悍言变法，多见其不知量而已。至小品文字，间亦冷隽可观，又不容概没矣。”皆说诗论文之最精细语，可列为第一类。其《题靖节〈桃花源记〉》一首，自注云：“《桃花源记》，是性境现量，所谓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也。”其《题〈王右丞集〉》一首，自注云：“予官右丞时，何翺高以诗戏之，曰：‘此真诗人官职也。’自愧文质无底，何敢比辋川？特以夙敦禅悦，于公似有同情，万一他时有会处，则某甲虽不识一字，要须还他堂堂地做个人。”此则禅门见地与述怀者。然予尤爱其《读〈穆天子传〉》一首，自注云：“《我祖黄竹》三章，眷念民瘼，其词甚哀，又继以自数其遇，此祖宗仁厚开基之泽也。穆王此节，便应获没祗官，虽有徐偃，其不足以摇天下明矣。然于此见当日遨游，实鲜乐趣，非止居乐甚寡也。”此段见解，似前人尚未道过，议论亦甚透彻。任公归国时，刚甫赋诗，有“更生强聒曾无补，楚老相逢泣已迟”云云。其早岁所作极哀艳，至宣统后始变。壬子是民国元年，此时刚甫已辞官杜门，正其从岑嘉州、柳子厚诸家脱化笔致时也。

刚甫歿后一年有馀，予返旧京闲居，追怀旧辈，以周沉观（树模）、吴印丞（昌绶）、张子武（其煌）及刚甫四人为《凉夜追悼》诗，各